

李云翔生平事迹辑考及《封神演义》 诸问题的新认识

周明初

内容提要 李云翔是《封神演义》的修订、写定者和评点者，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目前学界所知甚少。根据分散在海内外的李云翔所编著的一些书籍中的材料，对李云翔的生平、著述和交游进行辑考，大致可以考知李云翔的生平事迹，同时对涉及《封神演义》的一些问题的重新认识，如《封神演义》的成书与刊刻时间、李云翔是不是《封神演义》的主要写定者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李云翔 《封神演义》 事迹辑考

有关《封神演义》的编著者，自20世纪20、30年代以来，即有许仲琳、陆西星二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据日本《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始倡许仲琳编^①，为后来的大多数学者所信从；张政烺据《传奇汇考》“顺时条”的记载考证为陆西星，得到胡适的支持^②，后来柳存仁加以发扬^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内阁文库所藏舒载阳刻本的影印面世，学者们认为李云翔也是《封神演义》成书的重要人物：章培恒认为《封神演义》由许仲琳、李云翔写定，而且李云翔是主要的写定者^④；徐朔方认为许仲琳是《封神演义》的早期写定者之一，李云翔是重订者^⑤；陈大康则认为李云翔是《封神演义》成书的重要人物^⑥；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新著》、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都认为李云翔为《封神演义》编著者^⑦。

可以说，李云翔作为《封神演义》成书的重要人物，现在已经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可。不过，有关李云翔的生平事迹，也与《封神演义》的早期写定者许仲琳一样，目前学界所知甚少。仅是据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封神演义》明末舒氏刻本卷首李云翔自序所署，知其字为霖，邗江（今扬州）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② 张政烺、胡适《封神演义的作者》，《独立评论》第209期（1936年），第18—21页。

③ 柳存仁《陆西星吴承恩事迹补考》，《和风堂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2—1415页；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又《〈封神演义〉作者陆西星》，《宇宙风》乙刊第24期（1940年）。

④ 章培恒《〈封神演义〉的性质、时代和作者》，《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6、299页；原为江苏古籍出版社《封神演义》1991年版前言。《〈封神演义〉作者补考》，《不京不海集》，第300页；原载《复旦学报》1992年第4期。

⑤ 徐朔方《论〈封神演义〉的成书》，《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50页；原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3辑（1994年）。

⑥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

⑦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中国文学史新著》（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人。其实，李云翔所编著的一些书籍，分散地保存在日本及国内的一些图书馆中。根据这些古籍中所提供的材料，大致可以考知李云翔的生平事迹。

这些现存的古籍，除原藏日本内阁文库、后影印收入《古本小说集成》的《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以下简称《封神演义》）外，尚有：一、《批评出像金陵百媚》（以下简称《金陵百媚》）二卷图一卷，李云翔著，明万历年间刻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原内阁文库）所藏；二、《新镌六院女史清流北调词曲》四卷（以下简称《北调词曲》），李云翔著，明天启年间刻本，日本天理图书馆（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系同门黄仕忠教授提供复印件）；三、《新镌诸子拔萃》八卷（以下简称《诸子拔萃》），李云翔评选，天启七年刻本，国内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八家单位有藏；四、《汇编舆图备考全书》十八卷（以下简称《舆图备考》），潘光祖汇辑、李云翔参订，崇祯六年（1633）傅昌辰版筑居刻本，南京图书馆、大连图书馆、烟台图书馆等有藏，《四库焚毁书丛刊》据北京师范大学所藏清顺治本影印。现据这些古籍所提供的材料，结合其他史料，对李云翔的生平事迹进行辑考并对涉及《封神演义》的几个问题进行新的认识。

一 李云翔生平事迹辑考

《北调词曲》目录之后有此书刊刻者、书坊主“秣陵龙光堂主人”庞应石的《附言》，叙此书刊刻缘起，于李云翔生平介绍较详。因《北调词曲》一书世人罕睹，现录全文于下：

为霖先生，广陵巨族也。少负奇侠，气宇丰隆。学擅百家，才堪倚马；独步艺林，为诸生冠。数奇不偶，铄羽金陵。本坊特延选订诸□，为海内先资。然于四美之晨，问酒秦淮，以写无聊之意。当酒酣兴逸之时，先生未尝不鼓掌称快。予因先生曩时有《金陵百媚》，次有《名姝词曲》，皆南调也，盛行海内，无不啧啧。兹愿先生将诸妓之技艺，亦可少助赏心，谱为北调，可称双美。先生大笑曰：“犹复作儿女态耶？”强之始可。于筵间凡寓目者，彻笔之。或曲或词，汇然成帙。予不敢秘，因梓之以供问花者一助云。庞应石识。

此文中称李云翔“学擅百家，才堪倚马，独步艺林，为诸生冠”，虽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但从李云翔作有涉及诗词曲的《金陵百媚》、《名姝词曲》、《北调词曲》，修订、评点小说《封神演义》，编选《诸子拔萃》，参订《舆图备考》等来看，说他知识渊博，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大致也不差。不过李云翔终究是个落第的秀才，从“数奇不偶，铄羽金陵”来看，他曾多次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南直隶乡试，均榜上无名。从“本坊特延选订诸□，为海内先资”来看，李云翔因为功名无望，生活无着，以替书坊主编著各种书籍作为谋生的手段。业余时间，大多是在秦淮河边寻花问柳，诗酒风流，借此打发光阴。他的《金陵百媚》、《名姝词曲》、《北调词曲》三书都是品评秦淮妓女的诗词曲之作，正是这种生活的产物。

李云翔的生卒年不详，据现有的资料看，他应当是生活于晚明万历至崇祯年间的人，也许还活到了清初。因为资料匮乏，他的生平经历已没法详细稽考。现只能据相关资料对李云翔在万历至崇祯年间的活动、著述和交游作一大致的勾勒。

1. 万历四十六年（1618）秋天，赴南京参加乡试，落第。在旅舍中遇冯梦龙，两人同游秦淮六院。在冯梦龙的怂恿下，写作品评六院名姬的诗词曲作品集《金陵百媚》。

《金陵百媚》卷首有李云翔作于“戊午秋日”的序言，叙自己作《金陵百媚》一书的缘起，其序云：

南畿为六朝都会，以其纷华靡丽胜也。其尤胜者，桃叶渡头秦淮旧馆是也。予兹岁铄羽金陵，旅中甚寥寂。偶吴中友人过予处，见予郁郁，呵余曰：“李生何自苦乃尔，岂素谓豪侠者，一至此耶？”因偕予游诸院，遍阅丽人。其妖冶婉媚，或以情胜、以态胜、以韵胜、以度胜，甚至以清真雅洁胜、以风流倜傥胜、以浓艳嘲笑胜。虽种种不一，无非乔妆巧抹，以媚人也。总之，千万难

当什百，亦何异于当今之世，尽以狐媚公行哉。予殆为之不平。友曰：“子既为之不平，何不一为之平，以洗近日之陋于见闻者。”遂强予。予不觉走笔之下，随花品题，阆然成帙。然次第中微有讽评，大都取其姿态雅洁、丰艳妖媚、清芬可挹、秀色可餐者为最。舍兹而往，品斯下矣。噫嘻！花固以媚人为主，而又不尽以媚人取也。予间有录者，正为青楼之规箴、风月之藻鉴耳。虽然，岂若今之狐媚以媚人者耶？噫嘻！真可涕也。人才之难，从古皆然，何独辈中哉！予何能，谬为不情之加以眩具眼者。因叶君请梓，以公同好，故名“百媚”。其所以媚者，又非兹集所能尽也。戊午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序中所称的“吴中友人”当指冯梦龙。因为《金陵百媚》一书题识为“广陵为霖子著次，吴中龙子犹批阅”，在卷首图像后还有题署为“吴中友弟龙子犹九顿”的简短跋语。可知这位“吴中友人”即“龙子犹”，而“龙子犹”正是冯梦龙常用的别号。从这篇序中，可知李云翔在该年秋天赴南京参加乡试，落第后，在旅舍中得遇冯梦龙。两人共游秦淮诸妓院，遍览丽人后，在冯梦龙的怂恿下，才作了《金陵百媚》一书。此书用诗词曲的形式品评六院名姬，冯梦龙作有眉批和评语。据此序，此书的刊刻是“因叶君请梓，以公同好”，叶君，当指作有该书凡例识语的“萃奇馆主人”叶一夔（凡例后所署“萃”字草体，近似“芊”字，然图像一卷每叶之书口俱有“萃奇馆藏版”字样）。而据此书题识“阊门钱益吾梓行”，该书应当刊刻于苏州。

2. 天启五年（1625）负笈游学至蕪州黄州一带，在麻城结识李长庚，并拜李长庚为师。

《舆图备考》卷首有署“崇祯六年岁次癸酉”的李长庚所撰序言，言及李云翔云：“乙丑岁负笈蕪黄，余得识其才品。始从余游，叩之不竭，澄之不清，真渊含无际，望而知为异人。然尚伏胶庠，未遂厥志，于三吴都下，日以著述寓意，亦一段忧世热衷不能已也。”

按：李云翔《舆图备考》有序云：“予尝纵游京师、海上以及吴楚间。”据李长庚此序可知李云翔游楚是在“乙丑岁”。乙丑岁即天启五年（1625），“蕪黄”是蕪州黄州的合称，正是楚地，明时属湖广布政司，今属湖北省。

李长庚，字西卿，湖广麻城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明史》卷二五六有传。据本传，李长庚于天启三年（1623）诏拜为户部尚书，未任，以忧归。麻城在明代时属黄州府（今属黄冈市），离同属黄州府的蕪州（今黄冈市属蕪春县）也不远。李云翔在天启五年游学蕪黄时，李长庚正丁忧在家，故李云翔得于结识李长庚并拜他为师。据《明史》本传，李长庚于崇祯六年任吏部尚书时，因奏事触怒崇祯帝，“斥为民，家居十年，国变。久之卒”^①，可知他在清初是活了很长时间的。

3. 天启六年（1626）寓居南京，为书坊编著书籍，并参加南京的文人结社。初夏与友人同游秦淮河，在友人的怂恿下，复作品评六院名姬的《北调词曲》，由南京龙光堂刊刻。

《北调词曲》卷首有李云翔作于“天启丙寅岁孟冬月望后”的自序，叙自己写作此书的缘起，可以与上文所引庞应石的《附言》相对照。现也录全文于下：

讴歌嘲笑，是风月场中本色。独怪齷齪青楼，争蹈滥觞，恶道令人憎厌。纵秀色可餐，亦是辈中弃物。而尤怪坊间目瞽，令无知俗子目不识丁，易李为张、将昔易今。以予曩时所刻《金陵百媚》、《十丑十俊》、《名姝词曲》，改头换面，以宫作商，不知成何词、成何曲，镌刻成帙，真可喷饭。虽梨木之灾，然可耻无过于此。

今初夏予寓白下，同社友程、唐诸君，偕二三丽人，泛水秦淮。见两岸玉人如砌，弦管杂奏，清讴遏云，充乎盈耳。美哉，不复作人世想。越二日，庞君邀予步月，往阅诸姬，得竟其技焉。予不觉心动。庞君因以诸妓之艺为请，曰：“君昔者止言诸妓之品，未竟诸妓之艺。况今之妓如时花，然别是一番人，别是一番鲜艳。君何不以诸妓之才之色，谱为北调，并前刻，不南北两擅其美？君常怪他刻易君之词，此亦可以正其讹矣。”予有难色，而程、唐诸君强之。予笑曰：“此六

^① 《明史》卷二五六《李长庚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614页。

七年前儿女之态。今犹作此口业，为诸姬咒咀，增此俗子辈作生涯耶？”虽然，予于酒酣兴狂之时，不禁诸君之强，而技亦复痒。凡寓目者彻笔之，顷而成帙，因附之梓。谓予为冯妇亦可，谓予为见猎犹有喜心也可。故题数语于首，以识非予本意云。

与庞应石《附言》之“本坊特延选订诸□，为海内先资”相对照，知李云翔“初夏予寓白下”，实是应书坊之聘请，为书坊编著书籍。又从自序“同社友程、唐诸君，偕二三丽人，泛水秦淮”，可知李云翔参加了南京当地的文人结社活动，同社友有程、唐诸君。有关李云翔参与文人结社之情况的考证见下文“天启七年”条。

庞应石《附言》中说“先生曩时有《金陵百媚》，次有《名姝词曲》，皆南调也”，李云翔自序中说“以予曩时所刻《金陵百媚》、《十丑十俊》、《名姝词曲》”，知李云翔品评秦淮六院诸姬的作品，除《金陵百媚》、《名姝词曲》外，尚有《十丑十俊》。不过，《十丑十俊》、《名姝词曲》两种，暂无线索可寻，不知尚存人间否。李云翔自序中所言之友人庞君，即是刊刻《南北词曲》的南京书坊主龙光堂主人庞应石。

4. 天启七年（1627）寓居南京，参加文人结社活动，所评选的《诸子拔萃》完成并出版。

《诸子拔萃》卷首有李云翔、于仕廉二序。李序不署年月，于序所署时间为“天启七年岁次丁卯孟夏朔越十三日己酉”，可推知此书完成于该年四月之前，而刊刻也当在该年。此书为朱墨套印本，为南京余大茂、张起鹏所刊刻。

于仕廉序云“余门人李生广为搜罗，严为笔削，撷精扬华，芟芜剔翳，采辑成编，名曰‘拔萃’。叩余请序，余见而阅至终卷，快然有当于心也。其分门立类，真嘉惠后学，使读者一展卷而上下数千载人物、淑慝、君德、治功、兵刑、民事，无不了胸中。真可谓经纬世务、援证道德，采其实不炫其奇，去其诞而存其正，有俾于天下国家，羽翼经传，岂浅鲜哉。此真善读子书者。”评价不免言过其实。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二该书提要“是书成于天启丁卯，取坊本《诸子汇函》，割裂其文，分为二十六类。其杜撰诸子名目，则一仍其旧。古今荒诞鄙陋之书，至《诸子汇函》而极，此书又为之重僵。天下之大，亦何事靡有也。”^①可知此书价值并不高。

作序者于仕廉（1560—1645），字元贞，号振方，金坛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管通州粮储。累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云南，晋南京太仆寺卿，迁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督粮储。天启二年，引疾归。甲申闻变，号恸失次，绝食七日，为家人所救。第二年竟以绝食卒^②。于仕廉为《诸子拔萃》作序时，正当引疾家居之时，所署官衔为“钦差总督粮储、南京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其序中称“余门人李生”，可知于仕廉与李云翔存在着师生关系。

《诸子拔萃》一书价值虽不高，然可注意者，是该书每卷卷首所列的评选、参阅、较（校）梓者名单，从中可以知道李云翔寓居南京、受聘于书坊期间的活动、交游情况：

此书封面题识“秣陵余思泉、张宾宇梓行”，而从卷一、卷四所列“余大茂思泉甫较梓”及卷八“秣陵余大茂思泉甫较梓”，卷二“张起鹏宾宇甫较梓”、卷五“秣陵张起鹏宾宇甫较梓”，可知此书刊刻者余思泉实名为大茂、张宾宇实名为起鹏，他们既是书坊主，同时又参与了此书的校勘。

此书卷一为“秣陵社友唐捷元垣之甫参阅”，卷二为“秣陵社友唐光夔冠甫甫参阅”，卷六为“春谷社友盛于斯方圆甫参阅”、“江都社友曹大阶升之甫较梓”，可知李云翔在此期间，所参加的文人结社，其社友有南京人唐捷元、唐光夔，南陵人盛于斯，江都人曹大阶等。李云翔《北调词曲》序中所提及的“同社友程、唐诸君”，也当是这一文人结社的社友，其中的“唐”可能就是指唐捷元、唐光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二，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127页。

② 《（民国）重修金坛县志》卷九之一，《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3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

夔，或其中的一人。

此文人结社，当天启年间，名称已难考稽。社中之人物，也大多不可考，可考者为盛于斯。盛于斯，字此公，南陵（今属安徽）人。诸生。家多藏书，闭户读书，有声邑里。其父死后，至金陵，散金结客，欲尽交东南士，终为人所诟。工书，能以左手作书。崇祯四年（1631），结识周亮工于金陵。崇祯十三年前后逝世，周亮工为作《盛此公传》。盛于斯初名钱，字铿侯，后改名于斯，字此公^①。据《诸子拔萃》卷六，可知其又字方圆。春谷，为南陵之旧名。施闰章《瑟斋诗序》：“吾宁在汉为丹阳郡，而春谷县见于当时，即今南陵也。”^②

5. 崇祯三年（1630）至崇祯六年（1633）寓居南京，着手《舆图备考》的参订工作，并于崇祯六年冬天完成。

《舆图备考》题识为“明关中潘光祖海虞父汇辑、邗江李云翔为霖父参订、绣谷傅昌辰少山氏校梓”，卷首有李长庚、宗敦一、李云翔三篇序，作于崇祯六年（1633）癸酉。李云翔序中交代了参订此书的缘起：

适盟兄傅少山以潘大参海虞先生未竟之《备考全书》示予。观其略，不止记山川名胜、资纸上卧游，实有关经济者。予不愧续貂，从《一统志》而损益之，详以诸记述及予之耳目所见闻者……是书越三寒暑、五脱稿，兹冬月之初始告厥成。故为之序，以述海虞先生创之始而竟于予者。

从“是书越三寒暑、五脱稿，兹冬月之初始告厥成”，及文末所署“癸酉冬之十日书于秦淮之两娱轩中”，可知《舆图备考》的参订工作完成于崇祯六年冬，而李云翔则长期寓居于南京。很可能从天启六年（1626）受聘于南京的书坊，为其编著各类书籍开始，他就一直寓居南京，并以为各书坊编著、评选各类书籍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了。

《舆图备考》一书的汇辑者是潘光祖。潘光祖，字义绳，号海虞，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授吏部主事，历户部郎中。崇祯五年（1632）任山西布政司参议、分守冀南。因农民军过境，光祖误信招安，致使临县县城为农民军攻破，遭受劫掠。光祖因招降之误被法司逮问，因耻对狱吏，绝食而死。光祖性清介，执法不挠。晋民悲光祖之死，立祠以祀^③。

今甘肃省境，明代属陕西布政司及陕西都司，清代才与陕西分治。狄道属临洮府，明代时隶属陕西，故可称“关中”。潘光祖因为任山西布政司参议，故李云翔序中称他“潘大参”。实际上这称呼并不确切，应当称他为“潘少参”才对。明代布政使司设有职官布政使、参政、参议，以参政、参议分守各道，其中参政别称“大参”、参议别称“少参”。李云翔称潘光祖为“大参”，是将参政、参议混淆了。

从李云翔之序“越三寒暑”来看，大约崇祯三年（1630）年李云翔已经从傅昌辰手中得到了潘光祖的《舆图备考》原稿。潘光祖死于崇祯五年（1632）或稍后，不知为何在他生前，他的未竟稿就流落到了南京的书坊中。现在也已经难以考证他的原稿是什么样子，李云翔在多大程度上作了修订。

以上是对李云翔生平所作的勾勒，因为资料所限，目前能够辑考的也就这一些。最后，关于他的籍贯和字号，也值得在这里提出来讨论。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二“《诸子拔萃》八卷”提要云“云翔字为霖，江都人。”^④核之李云翔

① 周亮工《盛此公传》，《赖古堂集》卷一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4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72—474页。

② 施闰章《瑟斋诗序》，《学余堂文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5页。

③ 参《（乾隆）狄道州志》卷八，《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324），台湾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541页；谈迁《国榷》卷九二，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5597、5602页等。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二，第1127页。

所编著的书籍，其字或号，或称“为霖甫”，或称“为霖子”；其籍贯，或称“邗江”，或称“广陵”：

《封神演义序》文末署名为“邗江李云翔为霖甫”。

《金陵百媚》题识为“广陵为霖子”；卷首有序，文末所署则作“邗江为霖子”。

《北调词曲》卷首有序，文末所署为“邗江李云翔”，后钤两印，一为“李云翔印”，一为“中泠氏字为霖”；每卷卷首题识作“广陵为霖子”。

《诸子拔萃》卷首有《拔萃序》，文末所署为“邗江后学李云翔”；每卷卷首题识为“邗江李云翔为霖甫”。

《舆图备考全书序》所署作“邗江李云翔”；每卷卷首题识则作“邗江李云翔为霖父”。

云翔为其名，这一点是明确的。那么“为霖子”或“为霖甫（父）”是其字还是号？《封神演义序》、《诸子拔萃序》文末署名后所钤两印，均为“李云翔印”和“为霖父”，不过字体并不全同。《北调词曲》在序末署名后钤有两印，一为“李云翔印”，一为“中泠氏字为霖”，由此可知“为霖”为其字，“中泠”为其号。《金陵百媚》在序末署名后所钤两印，一为“为霖氏”，一为“百花主人”，可见“百花主人”也是其外号。“中泠”、“百花主人”为李云翔外号，诸书均未载，据《北调词曲》、《金陵百媚》之钤印可补阙。

李云翔的籍贯，或称“广陵”、或称“邗江”、或称“江都”，三者什么关系？这正是本文所要辨析的。

“广陵”是扬州的旧称、别称，“江都”和“邗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广陵”的别名别称，与扬州也是同一概念。春秋时吴国，在今扬州一带，开凿了沟通长江和淮河的运河，称“邗”或“邗沟”，战国时楚国于这一带置广陵邑，秦朝时设为广陵县，西汉时则为广陵国，其下设江都县，至东汉设为广陵郡。其后“广陵郡”一名或存或废，至隋代开皇年间改称“扬州”。在隋代之前，“扬州”一名，本为古代九州之称，汉代则为十三刺史部之一，自汉代至隋代开皇年间前，扬州的治所并不在今扬州一带，所称“扬州”并不指现在的扬州。至隋代开始，所称“扬州”才固定指今扬州。隋代大业年间又改扬州称江都郡。唐至五代，或改称扬州，或改称广陵郡，曾多次改名。宋元时称扬州路，明清时称扬州府，名称变动较少。

西汉时所设的江都县，在此后名称较少变化；而秦时所设的广陵县，至隋代开皇年间改称邗江县，大业年间又改称江阳县，五代时又改为广陵县，北宋时合并入江都县，虽然在南宋时曾经复置，但在元代又合并入江都县了。所以在明清时期只有江都县没有邗江县^①。

查《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在扬州府下所领为三州七县，直隶扬州府之县为江都、仪真、泰兴三县，扬州府属高邮州领宝应、兴化两县，泰州领如皋一县，通州领海门一县。而江都县为扬州府治所在地^②。

李云翔是明代人，确切地说是明末清初人，他的籍贯按照明代正式的行政区划应当是“江都县”，《四库总目提要》称他为“江都人”，是非常确切的。至于他自称的“广陵”、“邗江”，在明代并不是正式的行政区域名称，可说是扬州或江都的别名别称。

1949年以后，我国的行政区划变动频仍。扬州和其属下的江都县也不例外。1949年以江都县城区（也即明清时的扬州府治所）划为扬州市，另设江都县城于仙女镇，江都县属扬州专区。1956年析出江都县南部、西部，复置邗江县，同属扬州专区，“文革”期间，全国专区改称地区，两县同属扬州地区。1983年全国地、市合并，江都、邗江两县同属扬州市，原扬州市区设为广陵区。2000年邗江县

^① 参戴均良等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薛国屏编著《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明史》卷四〇，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7—918页。

改设为扬州市的一个区；江都县则在1994年改称江都市，2011年撤销江都市，改设为扬州市江都区^①。

现在扬州市下辖广陵、邗江和江都三个区。这三个市辖区大致相当于明代的江都县地域范围。因为资料所限，按现在的行政区域，李云翔应当属于哪一个区，已经无从考证。不过，我们对他的籍贯进行古今地名标注时，可以写成“李云翔，明代南直隶江都县（今江苏扬州市）人”。

二 李云翔与《封神演义》几个问题的新认识

《封神演义》是部世代累积型作品，在经过长期的民间流传后，由许仲琳、李云翔加以写定。这可以说是现今的大多数《封神演义》研究者的共识了。但关于《封神演义》的成书刊刻时间、李云翔是否主要写定者等问题，都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些问题的存在，其实都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舒氏刊本《封神演义》卷首李云翔序有关。李云翔的序，没有署具体的写作时间，而且涉及《封神演义》的叙述，含混不清。

笔者认为，结合李云翔的生平著述加以考察，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封神演义》的成书与刊刻时间

鲁迅据张无咎所作《平妖传》序中已提及《封神演义》，认为此书成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②；孙楷第据万历四十八年（1620）武林藏珠馆刊本《唐传演义》也为舒载阳所梓，认为《封神演义》也为万历末年或泰昌、天启年间所刊^③；章培恒认为张无咎所作《平妖传》序，原序和后来经过修改的序之间存在差异，不能作为认定《封神演义》的成书时间，结合日本内阁文库所藏舒氏刊本李云翔所作序，认为《封神演义》既然假托钟惺批评，刊刻时间一定是在钟惺死后，钟惺死于天启四年，因此此书刊刻于天启四年或五年^④；李亦辉则认为在舒载阳刊本前存在一个早期刊本，其早期刊本在泰昌元年前当已经行世，在万历年间甚至更早的嘉靖、隆庆年间均有可能，而经过李云翔修订评点的舒载阳刊本则成于天启五年至崇祯三年之间^⑤。

笔者认为《封神演义》刊刻于天启以前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有二：

第一，据章培恒发现，冯梦龙所补的《平妖传》有张无咎序，作于泰昌元年的原序中没有提及《封神演义》，而崇祯年间苏州嘉会堂重刻时重新修订的序中则提及了《封神演义》^⑥，这说明在泰昌元年张无咎作序时还未看到《封神演义》，而在崇祯年间修订序时已经看到了此书。可见此书当成于天启至崇祯年间。

第二，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封神演义》舒氏刻本的版式特征来看，此书当刊刻于天启至崇祯年间。舒氏刊本卷首李云翔《封神演义序》中，“我国家景运洪开，于斯文独盛”之“国”字，刊刻时高出了左右各栏一个字的位置，突破了原来的边栏。无独有偶，前文所提到的刊刻于崇祯六年的《舆图备考》卷首宗敦一的序中“建置沿革之机宜，皆经圣祖之擘画者”之“圣”字也是这样处理的。这样的处理法，在清刻本中很常见，在明刻本中则很少见到，也是在天启、崇祯年间的刻本中才会遇

① 参薛国屏编著《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并参《国务院关于同意江苏省调整扬州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函[2011]132号），资料来源于“行政区划网（www.xzqh.org）”。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74页。

③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119页。

④ 章培恒《〈封神演义〉的性质、时代和作者》，《不京不海集》，第291—295页。

⑤ 李亦辉《从词话本到刊本——论〈封神演义〉的成书、版本及编者问题》，《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114—115页。

⑥ 章培恒《〈封神演义〉的性质、时代和作者》，《不京不海集》，第291—292页。

到。为什么如此？明代文禁至天启、崇祯年间始严，如避讳、如涉及本朝的一些敬词的书写格式，都是至天启、崇祯年间才严格起来的。避讳方面，天启、崇祯之前遇帝王名讳，二名不遍讳，只要不是两字连在一起，是不避讳的，但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单独一字也要避讳，如前文提到的刊刻于天启七年的《诸子拔萃》中，“校梓”写作“较梓”，便是避天启帝朱由校的名讳而改字。在涉及本朝的一些敬词方面，天启、崇祯之前或顶格刻写、或字前空一格，并不严格，但天启、崇祯年间则很严格，遇转行时须高出一字刻写。

笔者赞成章培恒认为《封神演义》假托钟惺批评，刊刻一定是在钟惺死后的判断，但他认为钟惺死于天启四年，此书的刊刻是在天启四年或五年，并不可靠。章先生认为钟惺死于天启四年，这是沿袭了传统的说法，来源于谭元春为钟惺所作的《退谷先生墓志铭》“没以天启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实际上，钟惺死于天启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谭文中“四年”为“五年”之误记或误刻，李先耕《钟惺卒年辨正》^①、陈广宏《钟惺年谱》^②均有详细的考证。钟惺既然死于天启五年，那么此书刊刻于天启四年已无可能。刊刻于天启五年是否有可能呢？章先生认为钟惺去世当年（天启四年）书坊就假冒其名刊刻《封神演义》的依据是“由于苏州在当时是一个很繁华的地区，各地的文人来往于苏州的很多，书坊又是跟文人关系很密切的所在，一定会较快得到钟惺去世的消息。”^③实际情形并不如此。《钟伯敬先生遗稿》卷首有钟惺的门生、苏州人徐波所作的序，序中称“乙丑六月捐馆舍，岁暮来赴”。“赴”通“讣”，即报丧。又据《钟伯敬先生遗稿》附刻的徐波《遥祭竟陵钟伯敬先生文》可知，他是“腊月廿二日从楚僧灵文闻凶信”^④，徐波是钟惺的门生，他在苏州得到钟惺的死讯已是天启五年的年底，苏州的书商得知钟惺去世的消息应当不会早于他的好友徐波。因此《封神演义》刊刻于天启五年的可能性很小。

李亦辉认为舒载阳刊本之前有一个早期刊本存在，而舒载阳刊本成于天启五年至崇祯三年之间，也依据不足。

先看舒载阳刊本之前是否有早期刊本存在：

日本内阁文库所藏舒氏刊本卷首李云翔序云“俗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说，从未有缮本，不过传闻于说词者之口，可谓之信史哉？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携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李云翔于《封神演义》第二十卷（也即全书的终卷）后的“又批”中说：“余因伯敬先生所家藏缮本，又详为考订。”《封神演义》卷首扉页舒冲甫识语则说“此书久系传说，苦无善本。语多俚秽，事半荒唐。诬古愚今，名教之所必斥。兹集乃□先生考定、批评家藏秘册。余不惜重资，购求钁行，以供海内奇赏。”

这三段有关《封神演义》一书由来的文字，真真假假，闪烁其事，且说法不一，使人莫衷一是。所谓钟伯敬批阅或家藏，出于伪托，舒冲甫写作识语时，还未想好究竟该伪托谁，故在“先生”之前空了一格。关于这一点，《封神演义》的研究者基本形成了共识，不必费辞。结合这三条说法，有一点应当是明确的，李云翔写定和评点《封神演义》，确实是有底本作为依据的，这就是某先生的“家藏缮本”或“家藏秘册”，不过从舒冲甫所说“余不惜重资，购求钁行，以供海内奇赏”来看，这本子应当是个稿本（甚至可能还是未竟稿），所以才需要用重资来加以购求。如果早已有刊本在前，应当已经有不少人阅读欣赏过了，用不着说什么“供海内奇赏”，某先生也不必当作秘册来家藏，舒冲

① 李先耕《钟惺卒年辨正》，《钟惺著述考》附录一，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129页；原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

② 陈广宏《钟惺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245页。

③ 章培恒《〈封神演义〉的性质、时代和作者》，《不京不海集》，第295页。

④ 钟惺《钟伯敬先生遗稿》，明崇祯刻本。

甫也不必用重资来购求。舒冲甫只要像当时书坊主们常作的那样，对于销路好的书籍，换个牌记翻刻一下即可上市了。而且，如果真的有《封神演义》早期刊本存在，张无咎在泰昌元年为冯梦龙所补的《平妖传》所作的序中应当已经提到了，不必要等到崇祯年间金阊嘉会堂重刻时修改前序才提到。

再看舒载阳刊本是否成于天启五年（1625）至崇祯三年（1630）之间：

前文已经说过钟惺死于天启五年（1625）六月，该年年底他的苏州门生徐波才得到他的死讯，所以在该年年底前苏州书商得到钟惺死讯并且出版假托他评点的《封神演义》的可能性不大。又据前文李云翔的生平辑考可知，天启五年（1625）李云翔负笈游学于蕲州黄州一带，天启六年（1626）初夏寓居南京，作《北调词曲》，天启七年（1627）为南京书坊编选《诸子拔萃》。可见在天启五年至七年这段时间中，李云翔要么在外地游学，要么手头有别的书籍在编著或编选，也不大可能有时间从事《封神演义》的修订写定和评点工作。

那么有没有可能李云翔写定和评点《封神演义》的工作完成于天启五年游学于蕲黄之前、出版于天启五年或之后呢？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当时的书坊非常讲求出书效率，往往在书稿到手的一年半载中就刊刻问世了。如前文所提到的张无咎为冯梦龙所补的《新平妖传》所作的原序，据所署日期作于泰昌元年（1620）冬至前一日，而为嘉会堂重刻本所作的修改后的序中称该书“已传于泰昌改元之年”^①，可见张无咎作原序之时，《新平妖传》已付刊刻，并且很快就刊刻完成投放于市场了。如果李云翔在天启五年之前就写定和评点完成了《封神演义》的话，那么在天启五年该书就刊刻问世了，由于当时还没有得到钟惺死去的消息，伪托评点的应当是另外一个人而不会是“钟伯敬”了。

如此看来，《封神演义》成书和刊刻于天启年间的可能性并不大，它应当是崇祯年间成书和刊刻的。

张无咎崇祯年间为金阊嘉会堂重刻《墨憨斋手校新平妖传》所作的序中称“至于《续三国志》、《封神演义》等，如病人呓语，一味胡谈。”这说明这时他已经看到过《封神演义》。序中又说：“（《新平妖传》）书已传于泰昌改元之年。子犹宦游，板毁于火。余重订旧叙而刻之。”^②此序中提到了冯梦龙“宦游”，查冯梦龙于崇祯三年（1630）五十七岁时补岁贡，于崇祯四年或五年任丹徒县训导，崇祯七年（1634）升福建寿宁知县，于崇祯十一年（1638）六十五岁时卸职归里^③。冯梦龙宦游当是在崇祯四年或五年至崇祯十一年之间，张无咎重订此序并刊刻《新平妖传》也当在此期间或稍后，《封神演义》大约也是在崇祯十一年之前已经刊刻问世了。

据前文李云翔辑考部分可知，崇祯三年（1630）李云翔从傅昌辰手中接受潘光祖的《舆图备考》未竟稿，着手修订，至崇祯六年（1633）冬天才完成，所以这段时间里李云翔也不大可能腾出手来进行《封神演义》的修订、评点工作。因此《封神演义》的修订写定和评点工作，要么在崇祯元年至三年之间，要么在崇祯七年至十一年之间或稍后。李亦辉据李云翔序中“幸而天启文明，我国家景运宏开”，认为崇祯六年之后明朝风雨飘摇，李云翔不大可能说这样的话，因而认为李云翔在崇祯三年之前完成了《封神演义》的修订评点工作，不知他判断是崇祯六年后而不是崇祯四年、五年后或七年、八年后明朝风雨飘摇的依据是什么？而且，即使崇祯中后期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中，但包括了南京、苏州在内的江南地区一直还是繁荣安定的，李云翔序中的话不过是场面性的话，没法作认真考究的。

（二）李云翔是否《封神演义》的主要写定者

李云翔是《封神演义》的修订写定者和评点者，这一点研究者们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他是否主

^{①②} 张无咎《新平妖传叙》，《新平妖传》卷首，《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崇祯金阊嘉会堂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参陆树仑《冯梦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5页；高洪钧《冯梦龙年谱》，《冯梦龙集笺注》附，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93—404页。

要写定者，则仍有争议。章培恒认为《封神演义》虽由许仲琳、李云翔两人写定，但李云翔是主要写定者^①。而李亦辉则认为李云翔只是《封神演义》舒载阳刊本的修订评点者，而非该书的主要作者^②。产生争议的焦点，其实出自对李云翔序中涉及《封神演义》成书的一段话的理解有歧异，李云翔序云：

俗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说，从未有缮本，不过传闻于说词者之口，可谓之信史哉？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携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余不愧续貂，删其荒谬，去其鄙俚。而于每回之后，或正词、或反说、或以嘲谑之语，以写其忠贞侠烈之品、奸邪顽顿之态，于世道人心，不无唤醒耳。

这段文字含混不清，疑云重重：一、既然“从未有缮本，不过传闻于说词者之口”，又何来“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二、既然“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业”，舒冲甫“托余终其事”，“余不愧续貂”云云，自然应当是指完成钟伯敬先生未竟的批阅事业，那又为何“删其荒谬，去其鄙俚”？钟伯敬即钟惺是晚明时期的大名家，他的批阅为何会“荒谬”、“鄙俚”？三、如果说“删其荒谬，去其鄙俚”是指对《封神演义》本身进行加工修订，不是指对钟伯敬先生的批阅进行修订，那么这两句话为什么要接在显然是指批阅修订工作的“而于每回之后，或正词，或反说……”之前？四、从现有的《封神演义》篇幅为二十卷一百回来看，此书显然不止“一册”，舒冲甫既然花了重资，为何所购的只有一册，而不是全帙？五、从“于每回之后……”的语气来看，李云翔似乎又是对整部《封神演义》的批阅而言的，舒冲甫所购的不止只有一册。

章培恒认为：

序中明说“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而《封神演义》这样的大书，在当时绝不是“一册”的篇幅所能容纳的；这一册显非《封神演义》全书。既然不全，也就必须续写。因此，所谓“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这一段文字，是说舒冲甫购来的《封神演义》并未写完，托李云翔续成，李云翔不但续了其未完成的部分，而且对那已完成的“一册”也作了修改，并于每回之后加了评语。^③

李亦辉则认为：

李云翔序谓“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若按全书二十卷，每卷一册，共二十册计算，则“一册”仅为全书的二十分之一，显然无法刊行；而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书贾竟会如封面识语所言“不惜重资购求锱行”，这显然不合情理。揆之以理，“一册”之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一册”乃“一部”之误……二是李云翔故意说舒载阳所购仅为“一册”……但无论出于哪种可能，李云翔都只能是该本的修订评点者，而非作者，更谈不上主要作者。^④

笔者认为，联系目前存世的李云翔所编著或修订的几部书籍的刊刻情况，应当有助于李云翔与《封神演义》关系的认识。

1. “一册”很可能是版刻时产生的讹误。

检视目前存世的李云翔所编著或参与修订的几部书籍，卷首李云翔所作序均是据手写字版刻的，尽管这些手写字体不一，不是同一人的手迹，只有内阁文库所藏舒载阳刻本《封神演义》卷首李云翔序，并不采用手写字版刻而是用长宋体版刻的。猜想其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书坊要冒用钟惺批评的名义，将原来李云翔所作的序中涉及《封神演义》书稿来历的这段文字作了修改，李云翔原来的手

① 章培恒《〈封神演义〉的性质、时代和作者》，《不京不海集》，第296、299页 《〈封神演义〉作者补考》，《不京不海集》，第300页。

②④ 李亦辉《从词话本到刊本——论〈封神演义〉的成书、版本及编者问题》，《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115页。

③ 章培恒《〈封神演义〉的性质、时代和作者》，《不京不海集》，第294页。

迹自然没法照用了，只得用当时常用的版刻字体进行版刻，“一册”之“册”很可能就是版刻时误刻所致。因为无论从情理来推测，还是联系舒冲甫识语“兹集乃□先生考定、批评家藏秘册。余不惜重货，购求锓行，以供海内奇赏”及李云翔于《封神演义》第二十卷（也即全书的终卷）后的“又批”中所说“余因伯敬先生所家藏缮本，又详为考订”的语气来考量，舒冲甫所购《封神演义》都应当是整部而非只是一册（当然这部书稿也很可能是个未竟稿）。

2. 李云翔是《封神演义》的最后写定者和评点者，但认为他是主要写定者则依据不足。

除《封神演义》外，属于李云翔编选或修订的书籍，现存的还有《诸子拔萃》和《舆图备考》。《诸子拔萃》一书，尽管于仕廉所作的序中称李云翔“广为搜罗，严为笔削，撷精扬华，芟芜剔翳，采辑成编”，而据《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可知，该书不过是“取坊本《诸子汇函》，割裂其文”而成，实际所作的工作非常有限。而《舆图备考》一书，李云翔自序是“越三寒暑、五脱稿”，“始告厥成”，实际也只是根据《明一统志》中的材料，将潘光祖的未竟稿进行加工增订而已，《舆图备考》的主体部分是潘光祖完成的，李云翔仅是个修订者。《诸子拔萃》的题识为“江上李为霖评选”、《舆图备考》的题识为“明关中潘光祖海虞父汇辑、邗江李云翔为霖父参订”。可以说，这两书相关的著作权问题是明确的。

《封神演义》与《舆图备考》一样，都是在他人所作的书稿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加工。比较一下这两书中李云翔之序，有些说辞也非常相似：

《封神演义》序云：

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携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余不愧续貂，删其荒谬，去其鄙俚。而于每回之后，或正词、或反说、或以嘲谑之语，以写其忠贞侠烈之品、奸邪顽顿之态，于世道人心，不无唤醒耳。

《舆图备考》序云：

适盟兄傅少山以潘大参海虞先生未竟之《备考全书》示予。观其略，不止记山川名胜、资纸上卧游，实有关经济者。予不愧续貂，从《一统志》而损益之，详以诸记述及予之耳目所见闻者。两篇序中都说书稿是从书商那里接手过来的别人所作的“未竟”之稿，都说自己“不愧续貂”，并说了自己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可以说据李云翔的自序，他为这两部书稿所作的具体工作是比较明确的，都是属于增补、修订之类工作。《舆图备考》一书还能够在题识中明确“邗江李云翔为霖父参订”，而舒载阳刊本《封神演义》除第二卷卷首题有“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金阊载阳舒文渊梓行”外，于每卷卷首仅题“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对于李云翔的参与修订根本没有提及。如果按照《舆图备考》的题识，《封神演义》应当题识为“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邗江李云翔为霖父参订”才对。要不是舒载阳刊本上还保留着李云翔所作的序，说明了自己对《封神演义》做了哪些工作，后世的人们根本不会知道李云翔是《封神演义》的修订者和评点者。

对照《封神演义》、《舆图备考》的题识和李云翔的序来看，认为李云翔是《封神演义》的主要作者（写定者）的依据不足。他对于《封神演义》所作的工作，与他对于《舆图备考》所作的工作性质是类似的。他修订《舆图备考》“越三寒暑、五脱稿”，最后在题识中有一个“参订”的名头，而他修订、评点《封神演义》，连个“参订”的名目也没有。很可能李云翔对《封神演义》所付出的劳动，还没有他对《舆图备考》的来得大，所以《封神演义》的刊刻者觉得即使不署上李云翔的名，连“参订”的名头也不给他，也问题不大。如果李云翔真的是《封神演义》的主要写定者，《封神演义》的刊刻者恐怕不敢将他的功劳一笔抹杀。因为当时的李云翔在书坊主眼里已经是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的“今日名公”了。《北调词曲》在卷首的《凡例》后有一则《征文启》，文内将李云翔（为霖）与当时的名家如张鼐（侗初）、陈仁锡（明卿）、徐奋鹏（笔洞，当作笔峒）、钟惺（伯敬）、袁中道（小修）、陈继儒（眉公）等并提，该文云：

夫海内文章蔚起，名公巨儒，揆藻抒奇。或选述书史，著辑坟典，托兴喻物，继往开来，厥功匪细。若今日名公，如张侗初、陈明卿、徐笔洞、钟伯敬、袁小修、陈眉公、鲍在齐、黄赞伯、陈古白、马君常、何非鸣、李为霖、李子素、周君建、周介生、支小白诸先生，删烦订讹，采择群书，以策后学。其为艺林先鞭非乎？

从这则《征文启》可知，早在天启年间，李云翔已经是书坊主眼里可以与钟惺、袁中道等并提的“今日名公”了，这应当与他所创作的品评秦淮名姬的通俗文学作品如《金陵百媚》、《名姝词曲》、《十丑十俊》等盛行于世，为书坊一再翻刻有关。有着这样的名声，并且已经编选、修订了如《诸子拔萃》、《舆图备考》等多部书籍，崇祯年间才有书坊主请他修订、品评《封神演义》，如果他所做的实际工作足够多，在“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之下，再打上“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邗江李云翔为霖父参订”之类，岂不是更完美？

三 余 论

正如宋元时期的书会才人造就了宋元戏曲和说话艺术的繁荣一样，明代中后期的下层文人也造就了明代出版业和以小说为主的通俗文学创作的繁荣。在明代中后期商业经济发达的南京、苏州、杭州等江南地区以及刻书业发达的福建建阳一带，都聚集着一批依托于书坊业，为书坊主编著、评选各类书籍的下层文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早期习儒，有志于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因为科场失利不得不直面现实。为了维持生计，他们来到当时经济发达的城市，因为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和知识素养，受聘于书坊主，除为书坊编著各种通俗文学作品外，还评选、编辑市场销路好的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各种流行性读物。可以说，书坊主要求他们编著什么，他们就能编著什么。业余时间，他们往往组织起诗文结社，与社友之间进行诗文交流，切磋技艺；也常常与三五同好，流连于秦楼楚馆，在寻花问柳、调笑风情中打发光阴。他们的知识水准和创作能力可能参差不齐，但不妨碍他们与书坊主之间的相互合作。明代中后期出版业的发达、包括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创作的繁荣，离不开下层文人与书坊主的相互合作与相互依存。

近年来，对于明代书坊、书坊主与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而对于依托于书坊、对明代中后期的出版业发达和小说创作繁荣作出巨大贡献的下层文人，则注意得还不够，除了对冯梦龙等个别通俗文学创作的大家有着较充分的研究，对邓志谟、吴还初等少数下层文人有一定的研究外，对于这些依托于书坊的大多数下层文人还缺少最基本的研究。而对这些下层文人缺乏研究，则会影响到对明代中后期通俗文学编创方式的认识以及对这些文学作品的性质和价值的评估，甚至影响到对明代文学史的认识。

也正如宋元时期的大多数书会才人一样，由于传世的有关他们的资料很少，即使有也显得零碎而且分散，甚至相互歧异，明代中后期的这些依托于书坊的下层文人，大多数也是生平事迹难以稽考，甚至连籍贯、字号也不容易弄清。这方面，李云翔可说是个幸运者，因为有关他的资料，分散保留在他所编著的书籍中，尽管比较零碎，但通过辑考、汇聚起来，还是能够对他的生平事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李云翔可说是明代中后期依托于书坊业从而得以生存的下层文人的一个典型，他的个人经历和生活状况，在当时的这类文人中具有代表性。通过他，我们可以加深对明代中后期下层文人的认识。

〔作者简介〕周明初，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过专著《全明词补编》等。

（责任编辑 石 雷）